



儒释道的融合

明清时期的道教劝善书

文 孙茜

劝善书，是宣传伦理道德、以劝人为善去恶为宗旨的通俗教化书籍。劝善书产生于宋代（以道教《太上感应篇》的出现为标志），兴盛于明清时期，当时各种劝善书的流通量“几与四书五经相埒”，可见其传播之广。劝善书将社会的伦理道德思想进行了具体化和世俗化的处理，使民众百姓易于接受和理解。

在诸多类型的劝善书中，道教劝善书出现的时间最早，影响较大，数量也较多。尤其是明清时期的道教劝善书，既与道教的教理教义密切相关，同时也融汇了儒、释二家思想在内，极具特色，为后人研究明清时期儒释道融合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一 明清时期的道教劝善书很多都阐释儒释道“同理”。比如，《藏外道书》中的《起生丹》一书说：“圣贤之心，即仙佛之心。仙佛之言，皆圣贤之言，其理一也。”儒释道三家本是“一理”。三家尽管说法不同，但是却同此一心。所谓“儒曰正心，道曰存心，释曰明心。心正则不乱，心存则不放，心明则不蔽”，尽管侧重点和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劝人为善的目标一致，所以可以互相取长补短，达到劝善止恶的目的。

在形式上，宋元时的道教劝善书还主要是以道教神仙的名义降授，而明清时的道教劝善书则出现了儒释道的圣、仙、佛都有的情况。在书中，神、佛之间互相支持、互相补充。道教神仙邀请佛门弟

子讲道、说法。比如，《藏外道书》中的《照心宝鉴》，就是吕仙邀请佛门弟子“来坛说法，普设慈航”所说的内容。

明清时期的道教劝善书与儒家思想的结合尤为紧密。尽管也还是围绕神仙的道德设定、监督、惩恶扬善来进行道德教化，但是所倡导的道德内容常常与儒家思想一致，实际上，这个时期的道教劝善书反映的已经是融合儒家思想而形成的社会一般的道德信条。正如清代大儒俞樾在《太上感应篇缙义》中所说：“此篇虽道家之书，而不悖乎儒家之旨。”尽管他这是对《太上感应篇》的注释，但却适合所有道教劝善书。比如，出现于清雍正二年（1724）的《文昌帝君功过格》，其内容共分伦常、敬慎、节忍、仁爱等8个方面的内容，尽管以道教文昌帝君为名，但主要是以儒家伦理教化思想为主。实际上，这与明清时期道教发展的状况有关。随着道教与世俗社会生活的结合程度不断加强，明清时期的道教逐渐转向民间，更注重用道德伦理来劝化世人，因此伦理色彩更加突出，与儒家思想的结合自然也更为紧密。

道教劝善书所吸收的佛教内容则主要是因果观念和善恶报应的理论。比如，流行于明末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其立论的基础就是“行善积德”，并且要不事张扬。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子孙。”由于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因此必可得到神明的护佑赐福。

二 对于儒释道思想融合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当属明清时期著名的道教劝善书《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又称《觉世宝训》）。这部劝善书秉持道教度人的要旨，承袭道教自身倡导的惩恶扬善和积善成仙的修行法则，同时又援引儒释两家的学说丰富其内涵，也说儒家的忠孝节义，还说佛教的因果，因此被世人广为接受，被誉为“三圣篇”之一（其余两篇为出自宋代的《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将历来被儒家奉为伦理要旨的“忠孝节义”予以特殊的强调，并将其作为道教在世修行的重要内容。书中开篇就说：“人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之事。”认为儒家所说的“忠孝节义”是一切的根本、来源。书中强调现实生活与宗教生活的统一，所谓“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因此，儒家倡导的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实际上也就是道教修行的要求。书中所说的大众需要奉行的内容——“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

法，重师尊，爱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乡邻，别夫妇，教子孙”，完全就是儒家的伦理要求。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援引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也就是善恶与祸福具有因果对应关系，所谓“善恶两途，祸福攸分，行善福报，作恶祸临”。此外，凡人所做的一切，神明尽知，因此会予以相应的奖惩。所谓“一动一静，神明鉴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况报应昭彰，不爽毫发。”这些说法都强调赏善罚恶，关注因果报应，显然是融合了释道，吸收两者相似的部分。

明清时期的道教劝善书是通俗的道教伦理教化书，它既是明清时期道教融入世俗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儒释道融合大背景的展现。这些文献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宗教的融合特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独特的视角，值得深入探讨和挖掘。

【作者单位为大连大学。本文为辽宁省国际教育“十三五”科研规划课题（2018—2019年度）“‘一带一路’战略下来辽非洲留学生的社会支持网与跨文化适应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LNGJ110】

责任编辑 李巍

清雍正年间刻本《关圣帝君宝训像注》书影

